

学术动态

《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评析

邓媛, 马文娟

(新疆师范大学 历史系,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4)

自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打开后,震惊海内外,由此形成了世界性的显学——敦煌学。中外学者纷纷涉足其中,展开方方面面的研究,形成了众多的研究成果。虽然,敦煌文书所关涉的内容非常广泛,但事关有些课题的材料数量毕竟有限,难以展开深入研究。如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刘进宝教授凭借多年孜孜不倦的学术积累,对敦煌文书熟稔于心,经过十几年的酝酿和耕耘,终于完成大作《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该成果作为“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之一,已于200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敦煌学界研究归义军问题取得进展的代表性著作之一,令人耳目一新。

《唐宋之际归义军经济史研究》由引言和四章组成,第一章“土地制度及有关问题”,第二章“赋税”,第三章“徭役”,第四章“敦煌的种植业”。其中引言介绍了敦煌的人口和敦煌的耕地面积。第一章分为七节:第一节是归义军政权初期的人口调查和土地调整。第二节是私有土地的发展途径,分为三部分,土地的请射,土地的买卖,土地过户的法律标志——户状。第三节是土地私有权的另一标志——土地对换。第四节是与请田制有关的两个问题,分别是请田中的“于官纳价”和“不办承料”别解。第五节是营田。第六节是“自田之谜”。第七节是敦煌文献中的“大户”与“小户”。第二章分为六节:第一节地子,第二节官布,第三节税草,第四节税柴,第五节商税和户税,第六节归义军政权的税率与赋税制的特点。第三章徭役也分为六节,第一节P.4525《官布籍》所见的徭役及其赋税蠲免,内容包括都官、都头、牧子、吹角、打窟的赋税征免等问题。第二节归

义军时期的音声人及其赋役征免。第三节Dx.2149号《欠柴人名目》中的徭役与赋役蠲免,内容包括酒户、烽子、门子、厅子和堂子的赋税征免。第四节唐五代的“单身”及其赋役征免。第五节户役。第六节归义军赋役征免与晚唐五代中原王朝的制度。第四章包括两节,第一节唐五代敦煌棉花种植说质疑,第二节唐五代敦煌种植“红蓝”研究。

从章目上看,每章都是一个专题,所包含的论题都由经济史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组成,贯穿以小见大,彼此联系而不可缺少之内涵,对于归义军经济研究具有非常大的推动意义。其中大部分的专题论文已经在相关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并且在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刘进宝教授的这部著作完全可以说是近年来经济史研究中第一部系统研究归义军政权经济的专门著作,巧妙地把区域性研究和经济史研究推到了一个更新更高的层面,为归义军经济史研究的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阅读之后发现这部著作有不少值得赞赏之处。

其一,注重运用原始的历史资料。如所周知,选择和甄别史料对于研究工作来说,是决定学术研究成败的关键所在。唐宋以前区域性经济史研究文献资料匮乏,许多课题都无法深入。而敦煌出土的归义军时期的官私文书,涉及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没有经过后人任何的修改,是难能可贵的最原始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刘进宝教授正是运用这些宝贵的资料使归义军经济史的研究得以深入进行。例如在第一章第一节“归义军政权初期的人口调查和土地调整”中,作者运用《唐大中四年(850年)十月沙州令狐进达申报户口牒》、S.4710《沙州阴屯屯等户口簿》、S.2163《唐大中六年十一月百姓杜福胜申报户口地状》、Dx.2163、2393《唐大中

六年十一月女户宋氏申报户口田地状》等文书,分析了归义军政权初期人口调查和土地分配的状况。通过对比研究发现,从表面看,在归义军政权初期的土地分配并没有触动旧的土地占有关系。一个刚刚成立的新政权需要社会的稳定和较好的经济基础,为了能获得较多的赋税,暂时维持土地现状无疑是明智之举。实际上,归义军政权初期的土地政策已经开始有变化了,例如进行人口登记、土地调查、给无地的农民分配荒地等,然后根据人口和土地征收赋税。作者又分析了P.3254背《唐大中六年十月令狐安子状》和P.4989《沙州安善进等户口田地簿》等文书(16页),发现在归义军政权完成初期的土地分配工作时,“并没有继续推行均田制,也没有按均田制的方式进行土地的还授工作,而只是沿用了其有关概念而已。”(17页)这点在以往文献当中是没有明确佐证的。作者根据对出土文书的观察,不仅把材料运用的恰到好处,而且还提出自己新的见解,在某种程度上修正并完善了正史典籍中的记载,为今后的经济史研究奠定基础。

其二,在研究方法上“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而不是“作孤立‘点’的研究”,注意“点”与“面”的结合(严耕望:《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7页)。有些学者在做史学研究时往往把问题限定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以期取得更好成果,如此状况往往是最容易出现错误的。作者的研究方法恰恰避免了这样的缺陷。本书的研究区域虽然是敦煌地区,但是并没有把敦煌孤立于唐五代宋初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作者希望通过研究归义军政权的经济史,折射出整个敦煌地区的经济问题,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整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特点。就如第二章第六节分析归义军赋税制的特点中,作者明确提到唐前期实行均田制,赋税按丁征收,到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按照资产多少征税。归义军政权实行请田制,把土地作为征税的依据。归义军政权的赋税政策以中原地区的政策为基础,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适合自身需要的政策。从唐前期的“丁身为本”——建中元年的“以资为宗”——归义军的请田制,实际上就是以赋税政策的变化为线索,既突出了敦煌地区赋税政策的特点,也反映出唐宋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过程,很自然地就把敦煌地区经济史研究纳入到了整个中

国历史研究的范畴,使得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得到再次提升。这种“点”“面”结合的研究方法是值得学者们学习的,也是历史研究所必需的。

其三,讲求实证,勇于创新。作为长期进行史学研究的学者,不断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固然重要,而勇于创新又是难能可贵。作者不断探求,勇于创新的治学精神在第四章中足以体现。关于唐五代时期是否有棉花种植的争议颇多。许多学者都认为当时已经有棉花了。但是随着资料搜集的进一步深入,作者大胆提出质疑。通过对于敦煌出土文书和出土物的研究,作者认为现在还无法确定棉花就是产自敦煌。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观点,作者详细阅读史籍中有关棉花的内容发现,在文献中并没有关于敦煌种植棉花的记载。通过对《史记》、《梁书》、《周书》、《后汉书》、《旧唐书》、《新唐书》等文献对比发现,仅一个“縠”字就变化很大。有些学者认为在敦煌文书中出现的“縠”字就能说明唐五代时期就种植有棉花了,因为“縠”通常就指的是棉织物。因此,作者采取了文字学的研究方法,考证“縠”字。通过对“縠”、“疊”、“𦃟”的分析发现,它们之间是存在混用现象的。“𦃟”在文书中,既指棉织物,又指毛织物。在敦煌的大量出土物中大部分都是毛织物,正好与此相吻合。由此作者认为,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实物证据,都无法说明在唐五代时的敦煌地区已经种植棉花了。作者在论证的过程中,把文献和考古证据合理结合,有理有据,不得不让人信服。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縠”字出现并不代表敦煌地区已经种植棉花的事实。这为西北地区经济研究又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在以上论证的基础上,作者又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官布到底是什么?在史籍文献中,对于官布都有记载,但是并没有明确官布是棉布还是毛织品,或者其他。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种植棉花研究》(《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认为官布就是棉布。有不少学者也持此观点。而在《太平御览》、《三国志》、《南齐书》等文献中都未作出定论,作者一直心存怀疑。通过对出土文书的仔细阅读分析,结合敦煌地区的地理环境,作者认为当时的纺织品主要就是毛织品,把官布定性为毛织品更为合理。这样就给近十年来悬而未决的官布的性质问题给了一个新的可选答案。

其四,注重研究成果的实用性。作者在第四章第二节的最后一一列举敦煌红蓝的种植和用途。红蓝作为一种经济作物,一度给当地居民带来巨大利益。除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外,红蓝对于当地的文化发展同样意义重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寺庙大量使用红蓝。此前已经有学者如王克孝等提出莫高窟壁画的主要原料有可能就有红蓝。在文中作者又再次强调这点,无非就是希望大家重视起来,如果确定,对于莫高窟的修复和保护工作意义非凡。

另外,这部著作对于西北地区经济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看出,作者希望史学研究的成果不仅为学术发展作出贡献,更希望能运用于现实社会的需要。

其五,治学严谨,注重学术规范。作者的这部著作是以敦煌出土文书资料为主,数量非常之大。在引用文书时,作者都认真注明资料的编号和名称。对于文书的内容,认真核对,尽量以原貌再现,避免出现添改现象。在第二章第二节《官布》中,引用《王申年官布籍》(112-114页):

“8.亩。计地贰顷伍拾亩,共布壹匹。

……

10.子贰拾伍亩。计地贰顷伍拾亩,共布壹匹。

……

23.吕神友肆拾肆亩,邓文德壹亩。计地贰顷伍拾亩,共布壹匹。

24.布头黑善兴壹顷陆拾捌亩,曹阿惟肆拾肆亩,田员保拾捌亩,张”

作者通过微型胶卷的对比校对发现,唐耕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中的第8行和第10行都少录“计地”的“地”,第23行的“邓文德”误录为“郭文德”。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中将第24行“曹阿惟”录为“曹阿堆”。这不得不令

人叹服作者的严谨和认真,也为其他学者正确地引用提供了帮助。

同时,作者对书中凡是引用的资料和相关文章论著都做了详细的注解,而且格式非常规范。这就方便读者能够在较短的时间里查阅相关的文献论著,也为与此相关研究的学者提供了资料汇总,受益匪浅。

对于不能确定的问题,作者也决不妄下定义。就如作者对于官布的性质问题,虽有怀疑,但是没有足够的有力证据,一直都不敢定论,直到找到令人信服的资料,才提出自己的见解。诸如此类还有很多,比如关于“大户”“小户”、“不办承料”、“自田之谜”等研究,都体现出作者的严谨治学态度。

尽管这部著作有诸多难能可贵之处,但是其中的一些问题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也可以说是给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首先,关于“自田之谜”的问题。“自田”在学界存在着三种观点,即均田土地说、完全私田说和均田私田说。作者虽然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资料,仍然没有获得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其次,敦煌地区的经济还应包括手工业等方面。作者对于这一点似乎涉及较少。根据敦煌地区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构成,手工业也应该是最具鲜明的地域特点和民族特点。而毛纺织业应该是最具代表的行业。在出土的大量文书中都有关于毛纺织品的记载。那么当时敦煌的毛纺织品的工艺到底是怎样的呢?除了生活所需,用于缴纳赋税,是否还有其他的用途?毛纺织业在敦煌地区经济生活的重要地位值得关注。最后,归义军后期的土地制度是否完全可以认为是“请田制”,看法不一,还需要深入论证。以上几点,都是很好的研究切入点,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以此为题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责任编辑:李蕾]